

哥 溫 著
陳 彬 蘇 譯

日本麻史大綱

易培基題



陈彬龢译

日本历史大纲

元仲署检

原序

約翰生 (Dr. Samuel Johnson) 曾說過：「一個人要能發見從前人所沒有發見的真理，纔可以從事著作，這倒是不必的。只須他能將知識的表面，加以變動，使從前沒有人注意過的種種美麗，重新顯露出來，該人心目，他也可以算得出色當行的了。」

我相信，我現在簡略的述說日本故事，至少我已做到了這個地步。倘然這意所包括的簡略的材料，已使我僥倖的得到了較大的成功，那我便不能不感謝我許多的朋友，也有日本人，也有美國人。

我尤其感謝日本事物的大歷史家 Dr. Y. Hagi，幫了我的忙，我將這本書呈獻於他。我也要記念着一個東京大學與東京商科大學裏現在已經去世的朋友亞納先生 Mr. C. S. Arnell。我對於在華盛頓大學的同事格立芬教授 Professor Eldon Griffin，也致其最誠懇的謝忱，他所幫助我的，都是最切實用的。他不但將這書的手稿讀過幾次，還給了我許多有價值的意見。我也謝謝發行這書的諸君，他們很熱心的和我合作，也給了我許多我所樂受的商榷。我所認為遺憾的，就是這書有了這許多助力，卻不能比了現在出版的格外寫得好些。

哥溫。

譯者序

不論那一個國，總必有她自己的歷史。為什麼會有歷史？為什麼要有歷史？這兩個問題，我想大家都能回答，不必我再費辭的了罷。可是從前一國的歷史，只關於這一國的本身，編著或談說的，是本國人，讀或聽的也只是本國人，現在卻不然了，一國的歷史，不單是關於這一國的本身，還要關係到並世的各國，編著或談說，讀或聽的，也不只是本國人，而並世各國的人都有了。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世界，已不是從前的世界，各國間彼此相關很切，往來很繁複，不能不彼此互相知道各個的歷史。爲了這個原故，日本人要知道自己的歷史，固然不必說了，就是美國人和中國人，也應得知道些日本歷史了。

這一國人要知道那一國的歷史，最簡捷的方法，自然是直接去閱讀那國已經寫成的歷史。要是爲了文字的不同，不能如願以償的，那只有閱讀本國內關於那國的記載。萬一本國的記載，又不能詳盡，那就只有去閱讀第三國對於那國已經寫成的東西。現在我們中國人，爲普通的原因，已是應當知道日本的歷史，爲特殊的或種原因，更應當知道日本的歷史。可是我國人中，能讀日本文字的能有多少人呢？自己國內對於日本的記載有多少數量呢？這也不待細說，當然都是不能使人滿意的，那我們只有去讀第三國爲日本所寫的歷史了。

不錯，讀第三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也須先了解第三國的文字，一樣的非人人所能辦到的事情，所以不能不借助於譯，如今我們所取的藍本，是美國人的著作，更不錯，美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可以由會英文的人翻

出來，那末日本人寫的日本的歷史，當然也可以由會日文的人繙出來了，何必又轉一個灣，一定要繙美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呢？

我不已是說過，現在世界上各國彼此間相關甚切，相往來甚繁復麼？我們要了解日本，要解決日本，要對付日本，已不是我們埋了頭所能幹的事情了。我們必須注意他在國際間的地位，他對於各國如何，各國對於他如何。爲了這原故，我就以爲繙譯和閱讀第三國爲日本所寫的歷史，比了她自己所寫的好，所以我就繙譯了這一本美國人哥溫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日本歷史大綱。

在這一本書中，至少，我們總可以達到幾種願望：一，基本的知道了日本歷史，和讀日文所寫的日本歷史，或我國人自己所寫的日本歷史一樣。二，進一步的，藉此知道了美國人和其他國人對於日本和日本一切措施的態度。我想這樣閱讀日本歷史，我們能得到兩重的收成。但是對於第二點，往往使人讀完了全篇，還不能留清楚的概念，我不能不在這一點上，趁着寫這篇序文的機會，多說幾句話，提醒一下。

直捷的說一句：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對於日本，是極端讚美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對於日本的措施是極端表同意的。當然不見得個個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如此，但以本書著者作代表，如此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不在少數罷。尤其是英國人，在目前的世界舞臺上，他們和日本人合作的表演，多少是清楚地顯現在我們眼前！現在且說本書，我可以找出不少他們親日的證據出來給讀者看。

在開始的「導言」與「發凡」兩章中，這樣的證據，舉不勝舉，只要將這兩章揭開來一讀，便可以知道他

們是怎樣的讚美日本。此後散見於各章，對於她的舉動，與以同意的；對於別國，故意撻低的，也不在少數。現在我們分數項來略示其一斑。

(甲) 關於高麗的

高麗和我國，在歷史上的關係，比了她和日本的關係，誰也知道深切的多。而在這書中，卻將這忠實歷史上種種事實抹殺了，只處處證明高麗和日本的同種同源。更有幾段，竟公然的說：

「高麗常在某種限度內，被人家看做日本的進貢國」（第三十五章高麗問題）「可是這還不能使日本心滿意足，所以在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又訂了一個新的條約。在那時期內，日本在高麗成就了許多的工作，如租稅與幣制的改良，銀行，郵政，電報，學校之設立，以及公共房屋的建築等等。固然，日本底統治高麗，有許多地方是缺少同情，缺少機智，這一點，伊藤自己也是承認的，但是這不祥的東西，高麗民族主義，把事情弄得更其糟了。一次叛亂的壓平下去，犧牲了二萬一千人的生命。……這位大政治家雖然滿心想高麗與日本合作，但是他底失敗，使他深深地失望了。四個月以後，當他在哈爾濱與俄國財政總長開會時，突被一個高麗的愛國狂人所刺死了。於是轟轟烈烈的一個大人物竟是這樣的提早結束了他的一切。……」（第十七章併吞高麗）

高麗常被人家看做日本的進貢國，這可以證明日本的吞併高麗是合理的。也和近來日本人的口號「我們從大陸上來，現在還向大陸上去」相符合。此外，高麗的民族主義，卻被他視之爲「不祥的東西。」愛國的安

重根視之爲「狂人」。這簡直就是說，高麗應爲日本所滅，高麗人一定不能反抗日本人，高麗民族是理應俯首帖耳，聽受日本人的宰割的。如果這樣的不談高麗民族主義，事情就不會弄得「更其糟了」。愛國的高麗人，都是「狂人」，只有甘心爲奴隸的順民，纔是有理智的人，這是什麼話！

(乙) 關於臺灣琉球的

臺灣是我國因爲中日戰敗，由馬關條約所割去的。而他卻說：

「或者那是中國人所快心願意的。」（第一章發凡）

關於琉球卻說：

「好久時候，她們屬於南方的一個部落族島，不過同時則祕密的奉中國爲宗主國。一八七五年，有些琉球漁人在臺灣被人所殺，因此她們便和中國不睦，決意改屬了日本」（第一章發凡）

在這兩節中，說臺灣的割讓，是中國人「快心願意」，說琉球人自願改屬日本，上面的話凡是中國人，和真正明瞭歷史事實的他國人，都不會承認罷。

(丙) 關於日俄戰爭的

「……外交是好滑的，和掩飾的；而日本則顯出她自己一種值得人家稱讚的鎮定和退讓。就她的情形而論，日後的動作是應當取守勢的，並且亦真是一種生死相關的事務。就俄國的情形而論，則有一種由俄皇鼓勵着的野心，想得滿洲，變做另外一個布喀喇，因爲當那奸滑刁頑的，和故意遷延的俄國外交部，從蘭司道

立夫的口中敷衍着的時候，而調遣東方來的軍隊數目，卻已在積極增加之中。末了，辛苦磋商了六個月之後，日本乃和俄國斷絕了國交關係，召回了她的公使，並且宣言着說，「她將要採取像她所考慮最好的獨立行動了。」（第二十六章對俄戰爭）

「……雖然實際上第一次的射擊，是由俄國人常他們攻擊到高麗去的日本運輸艦的時候而開火的，而日本卻是很在她的權利之中去奪得先聲的……」（同上）

俄國固然有不良之處，然而日本也未必就純然無疵罷。在此，將開釁的責任，完全加到了俄國的身上，又將俄國的當局，盡量的侮辱，為日本人效力之處，顯而易見。

（丁）關於中日戰爭的

是：
日俄戰爭我們且不談牠，中日戰爭是我們自己的事情，我們當然知道一切的究竟的，而書中的口吻則如

「在一八九四年春季，高麗南部一個叫做東學運動的叛亂的爆發，引起了閔黨（高麗專權的皇后所屬的黨），向中國求救……中國按了天津協定，派遣了二千五百名軍隊，另外又帶了可以使人惱怒的照會，反對宗主權的拋棄，『保護我們的進貢國，是我們往常的習慣相照合的，』於是日本派遣了同數的兵丁，到漢城的附近地方去，以作抵抗。這是不可掩飾的，一種明白侵略態度，最初就被中國駐使所取得，對於高麗是個進貢國的關說，亦不止一次的重複過了。再者對於日本為恢復秩序起見，而聯合行動的提議，亦沒有給

與任何的注意。中國的活動，似乎是在另一趨向之下的，因為當高麗進步黨首領金玉均從日本被誘出來，而就在上海被刺的時候，中國不但去懲罰那位高麗的刺客，卻反載了他在她一條戰艦之中，去接受在他本國中的光榮。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日本覺得將中國增添生力軍到高麗去的那事情，就是敵對的證據，事實上中國一萬一千名數目的軍隊沒有關照日本，就並由陸路和水路派出去了。戰爭立刻被人家承認是難以倖免的。有兩隻日本巡洋艦，被三隻護送運輸船高麗的中國戰艦所攻擊，戰事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那天開始的……」（第二十六章中日戰爭）

這一節中所說的，都是事實麼？說我們中國人「使人家惱怒，」抱着「侵略態度，」「中國活動似乎是在另一趨向之下，」「日本軍艦先為中國軍艦所攻擊，」我們的腦筋中當作何感想。

（戊）關於其他的

此外作者對於日本，還有許多顯著的表示好感之處。

「無限制的移民政策，對於太平洋的任何國家，可說都沒有利益的。不過我們希望美國當局須採用一種公平的政策，不要因為人種底差別而給以不公平的待遇。在澳洲，排日心理底強烈，並沒比美國底加利福尼亞省減少，但是他們卻竭力避免人種間的不公待遇，不願特別揀出日本人來排斥……」（第二十七章移民入美）

這其間雖然拈出了「人種」二字，但他的主意卻在日本。我們也是東方黃色人種，怕便得不到這樣的

仗義執言罷。他又因美國的干涉二十一條，深致不滿，他這樣的爲日本人說話，可以極賣力了。（第二十八條）

『日本底參加協約國方面，一方面保障了亞洲底安全，同時使參加西方大戰的各民族，減去了許多的麻煩』（第二十八章日本與世界大戰）

將日本在世界大戰中所立的功績，一項一項陳列了許多之後，就有這兩句斷語。最令我們痛心的，居然是「保障了亞洲的安全」

『神武天皇以後的繼統者，在歷史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紀載……繼統的方法，全是父傳子的世襲制，不過不定要傳之長子。究竟立誰，和中國習慣相同，是皇帝自己決定的。預備繼統的嗣子，稱之爲「太子」……（第四章神武天皇以後的繼統者）

神武天皇的時代是在西歷紀元前五六百年，正當我國的周朝。在這時候他們已能採去我國的立嗣法，稱繼統的嗣子爲「太子」，足見中日關係的早了，但作者對於日本歷史，只以神話和神史開始，一毫沒有提及中國，直到這裏，忽然提到了中國的「太子」二字；而在另一方面，則對於日本和高麗的最初關係，則不惜工夫，細細的老早就說起，證明高麗素來是日本的進貢國，這其間不能不令我疑惑作者的有心如此寫法。

看了以上這許多引文也夠了，不用再多引了。書中這樣的話還多得呢。他是寫給他自己的美國人看的，在在竭力的稱揚日本和日本人。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本書的作者竟似乎在那裏抹煞一切事實，故意作親日

的口吻。看來此書還有什麼價值呢？然而我以為本書的價值，有多少卻就在乎此。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要讀第三國人所寫的日本歷史的原故。

第一，這書的作者是美國人。美國人的口吻尚如此，英國人更不必說了。由此可知，世人對於日本感情究竟怎樣。他們不惜壓低了他國為她張目。返觀我國的行動，有誰這樣切實的幫我們呢？

第二，著者所以如此寫，除了他的居心果然不可問以外，至少總還有兩個原故。一是他不知道事實的究竟，二是日本人盡力的宣傳，因此他只知道日本對他說的話和供給他的材料。

由前之說，似乎是他的短處，為什麼不知事實的究竟，而可以貿然着筆呢？但我們返過來自己想想，他除了由後之說從日本人方面得到一切外，又從誰得到什麼呢？我們曾向世界各國盡力宣傳過我們的痛苦麼？我們會供給世人以另外的材料麼？到現在，我們似乎已知道留心於此了，還是微乎其微的數量，觀於濟案的經過就可以明白，那更不要說數十年之前了。他即使要存心幫中國，恐怕他也無從幫起，由此可知，我們對外宣傳的必妥；否則這樣輕重倒置，黑白不分的事實，如二十一條，如濟案，我恐怕還會不知有多少次要繼續的發生呢！

第三，我們想想看，這書的目的是寫給美國人看，自然和美國人同文的英國人，也在能看之列；他們本已是親日的，讀了此書後，其影響將如何？他們本不是親日的，讀了此書後，其影響又將如何？不將在他們的心目中，留下一個對日本極好的痕跡，以後再準備着對日本表示好意麼？國際間表示好意原是應該的，但是為什麼我們便沒有受好意之可能呢？

我們不要氣，只要記！我們不要惱怒，只要努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以這些精神，來讀這一本第三國人所寫的親日的，使我們難堪的日本歷史大綱而謀所以自處之道，應付之方，這是我們讀這書的特殊的收成，我們要珍重牠！

至於普通的收成，那就是藉此和曉了日本歷史的大略因為戴季陶先生所說：

『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風俗習慣怎麼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那裏？他們生活根據在那裏？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纔曉得他的現在是從那裏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實，方纔能夠推測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種族上，日本這一個民族，在遼東地方，除了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係着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洲，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甚重要。我們單就學問本身上說，也有從各種方面作專門研究的價值和必要，決不可淡然置之的。……』（日本論第四頁）

這些話，正可以作我們研究日本歷史的注解。當我繙譯這書的時候，看到了這區區三島的已往，想到了我們這巍巍大國的現在，不禁感慨係之。我先舉兩點出來，也就可以解釋我們讀這日本歷史的價值之一斑了。

一、在本書第二十六章中，說到一八九四年，他們——日本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不也是我們現在忍受着的痛苦麼？帝國主義者總是要以不平等待人的，你和他講理，他何嘗會睬你。但他們卻不能不睬日本！我看的確的，

實在內部的努力與團結，是這個事情的一大關鍵！日本維新後數十年來，努力於內部，全國一致團結，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理性的話，自然格外有理了。我們則如何？民國成立以後，四分五裂，到現在國民革命成功了，努力麼？團結麼？不可謂不在這軌道上行，但效力卻如此的微弱，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理性的話，也自然變作無理了。孫中山先生說過，看到了日本的發奮自強，居然能屈身於優越的白種人間，覺得我們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黃種人不是天生的劣者。我真希望我們果然能不負孫先生的希望呢。

二、戴季陶先生很稱讚日本人有「信仰的真實性」（日本論第一四〇——一五四頁）我也的確在這一部歷史中，找到了許多證據，可以爲戴先生的註腳。他的勇敢不怕死，激烈的自殺，真叫我們這暮氣沉沉的中國人，當之真妄愧死！而他們的民族意識又何其的深刻！可以看下列這幾句話，以見其例：

「……在文化上，她雖然從中國和別處，借來許多東西，可是她始終自有她的本色。並有人問過一個著名的日本孔教徒說：『假使孔子爲元帥，孟子爲副將，領了一隊，殺進日本來，你將如何對付？』那答語非常乾脆：『我將擊去孔子頭顱，而將孟子的肉放在鹹水裏浸着！』這就是大和魂的精神，她的光焰已照耀過二千五百年了。』（導言）

這樣的口氣，那得不叫人讚美！果然，他們採取了多少別國的文化，可是別國的孔子和孟子，爲他們所崇信，而想侵略他們的，已被他們擊死了多少！的確他們自有他們的「本色」，日本人總之是日本人，返觀我國，又如何呢？侵略我們的，還並非孔子和孟子之流，而我們素來對他們的態度是怎麼呢？固然他們是得天獨厚，孤處海

中，不易爲人侵略，但當元朝艦隊壓境的時候，他們是何等的全心全力，合禦外侮！「天助自助者」，我們至少也當有他們這樣的民族意識，這樣的民族自衛！

看了他們的歷史，引起了我對本國的感慨以外，又想到了他們現在的行動，在他們的歷史上，也有有例可援的幾點：

一、山東出兵，是他們消滅內爭的老手段，當一八七二年高麗大屠殺基督教徒的時候，本來干他們什麼事呢，他們卻大唱其出兵論：

「西部爲普魯士佔領了的法蘭西，沒有能力去阻止，或者代這種屠殺事件報仇。這使日本的插入，成爲加倍有意義的事情。一八六八年中所提起的干涉問題，在一八七二年，因爲國內發生了如何處置解散後的武士們的問題，而至於急性化了。西鄉隆盛立刻搶取了那時的機會，用了一種即時宣戰的方法，去保全那些武士們的榮光……」（第二十五條高麗問題）

原來他們的出兵，只是爲了解散後的武士們，放在國內無處安插，有些「不太平」！

還有呢，他們對中國挑戰的行動，固然有他們的野心爲根據，而他們要藉此消滅自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四年國會與政府的搏鬥，也實在是他們宣戰的導火線。

「……戰事將一切黨派都歸一致，愛國的熱忱完全超過於黨派的苦鬭了。」（第二十六章國會的搏鬥）

這話多少對呀，他們居然達到了一切目的。

最後呢，就可以提出二十一條的動機，再來作個證例：

「我們須要曉得日本所以提出要提出這二十一條的要求，並不是單純的出於一種侵略的野心。當時大隈爲要使政見不同的各黨聯合起來，一致抵抗政友會起見，不得不明白地標出一種「圖強的政策」，而爲貫徹此項政策起見，又不得不注意到能夠使日本立於西方列強之林的種種機會。所以他要求中國將顧問權與傳佈宗教權讓與他，都是與西方各國同出一軌的……」（第二十八章二十一條）

呀，原來野心之外，還有這樣的苦衷。

我們知道，這次他們山東出兵，一方面是怕國民革命成功了，他們得不到好處。一方面的確是爲了國會中正在提出彈劾內閣的問題，田中焦頭爛額，所以有此一著。這還不過是他們原來消弭內爭的一個老調而已。果然有效，自出兵以來，又造成了五三慘案，倒閣的聲浪就此沉寂了相當時候。唉，這種手段，可是巧妙極了，然而日本的民衆也算可憐極了！

二、日本民衆，大部分都是以軍閥的意志爲意志的。這次山東的出兵，濟案的造成，直接負責的，當然是日本的軍閥。但日本的民衆如何呢？我們天天在當心，日本的輿論很難得看見一言半語的公道話，大都還是和軍閥一鼻孔出氣。即使有一二清醒之人，爲了大勢所趨，又處在軍閥擅權的威逼之下，動不動就要解散國會，也只好噤若寒蟬了。現狀是這樣，他們的歷史告訴我的又如何呢？還不是一樣麼？本書中這樣事實很多，但清楚的說明

這層意義的，我們仍可以看戴季陶先生所說的話：

『日本軍國主義的組成要點何在？我們第一要看軍政權是統一在甚麼地方，所謂統制權的行使，是握甚麼機關之事；國防，外交，財政，教育，工業，這幾個重大政治機能，是如何運用。第二要看他軍隊組成制度如何，壯丁訓練的普及程度如何，動員的施設如何，社會的風紀如何。我們要能夠從這兩點仔細觀察時，就可以曉得，到日俄戰後幾年止，日本的確是一個澈上澈下的軍國。雖然是開設了會議，制定了憲法，然而政權的重心，完全是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動人物，完全是武人，議會不過是調濟民衆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內閣的主要任務，是以民衆意思和統治者意思兩個重要事實作基礎，從實際工作上，辦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軍國的企圖，能夠確實成立。而且就整個的政治機能上看來，內閣的機能，實在薄弱得很，與其說他是內閣，無甯說他是最高行政會議。再從財政上看，統制分配的基础，豈全是軍國的利害，而不是國民經濟的利害，配分的實際，是把軍費作爲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費，都不過是賸餘配分的地位。皇帝的稱號，恐怕不能確實掌握軍國，於是再加上陸海軍大元帥的稱號，軍令機關，以大元帥幕僚的意義，完全獨立於內閣之外，直隸大元帥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動搖。掌握政治中樞權能的樞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一方面是政權的最高集中點，而實際上確是軍令機關的政治代表處。外交方針，財政方針，教育方針，都以國防計劃爲基本，所以外交是軍事交際，財政是軍需，教育是軍事訓育。這一種關係，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的……』（日本論第八〇頁）

對了，我們還不如對於日本民衆的痛苦表示我們的同情罷，他們是多麼的可憐，照我看來，現在除了我們自己努力之外，簡直沒有第二條生路的了！

三、五三慘案中，日本兵槍殺我們許多無辜百姓，已是不得了了，而對於我們政府所派的外交官吏，還在槍殺之列，加以割刺耳鼻野蠻惡刑。他們當然不承認有這種的舉動，而世界各國呢，也只信他們的一面之辭，置我們有力證據於不顧。他們——日本和各國——以為日本是文明國，那裏會有這種舉動。可是請看罷：

『同年（一五八七）基督教徒受着了一種逼迫，通稱為二十六人的釘十字架。被刑的人中，有六個是西班牙的聖芳濟宗派教徒，三個日本的耶穌會教徒，十七個日本的非教徒。有三個是童子，在聖壇前做侍童的，年齡在十一至十四歲之間。在斬首之前，他們的肢體先被傷殘，在一個耶穌會教徒的記事裏面說，神父奧爾干丁拿，目睹着自己的耳鼻怎樣的被執刑者割去，他即以一副動人憐憫的和喜樂的淚，歡迎他們，作為『我恭敬獻給上帝的新教堂裏的鮮花……』（第十八章豐臣秀吉與基督教）

割耳鼻的確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是國學淵源，本有目的。只可憐我們無用的中國人，使我們和殉教徒一般的大勇士，又給他們試演了一會。

總之，日本的軍國民性，是不能改變的了！所能改變的，只有由這個軍國民性所發生出來的舉動方式，在現在，竟還連這些不良的舉動方式，還不能改呢！

桂太郎的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對孫中山先生的話，在日本論中記載得很詳，此地不便一一抄錄下來，只